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与分步走发展战略动态演进的内在逻辑

刘晓鹏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阳 550001)

摘要: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阶级斗争层面的政治指向阶段、生产与需要层面的经济取向阶段及需要与发展层面的社会转向阶段。70 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循序渐进建设现代化历程中制定了卓有成效的分步走发展战略,先后形成了“两步走”发展战略、“三步走”发展战略和新“两步走”发展战略。社会主要矛盾是制定分步走发展战略的客观依据,分步走发展战略为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具体路径,二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具有目的同一性和理论同源性。研究和分析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分步走发展战略动态演进的内在逻辑、总结经验,可以达到抚今追昔、稽古振今的良好。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 70 年; 社会主要矛盾; 分步走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7408(2020)01 - 0080 - 08

社会主要矛盾受制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并时刻凸显这一起着总源和制动作用的矛盾的性质,它是社会形态某个时期最突出的问题。在不同社会形态或者同一社会形态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截然不同。因此说,社会主要矛盾并非恒定不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基本内涵必定转变。社会主要矛盾事关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历程,其内涵的动态转变历程与分步走发展战略的动态演进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性。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分步走发展战略的科学内涵与以前大有不同。新时代如何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层次和结构,走好新的分步走发展战略是当前和今后我国需要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总结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社会主要矛盾与分步走发展战略演进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可为新时代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前夕至今,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

盾有过多次研判。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特征和内涵的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过程可划分为 1949 年到 1978 年的政治指向阶段、1978 年到 2017 年的经济取向阶段、从 2017 年起的社会转向阶段。

(一) 社会主要矛盾的政治指向阶段

党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8 年,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中,毛泽东提出,革命完成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为外部矛盾。1949 年,毛泽东在西柏坡谈到,革命胜利和土改完成后国内存在两种基本矛盾,国内矛盾为阶级斗争,外部矛盾为同帝国主义的矛盾。由此看出,新中国成立前夕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还不够科学规范,但基本是正确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我们党正确把握国内外局势新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有了更加科学的判定。1956 年,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指出,当前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

作者简介: 刘晓鹏(1991 -),男,石家庄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规律与经验。

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一研判，尊重了社会发展规律，符合当时国情，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第一次科学完整的判断。

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引发了波匈事件，并激起了西方国家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同时，我们党开展的整风运动导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助长了党内“左”倾思想。国内极少数分子利用国内外局势变化的契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这一系列复杂因素相互交织，致使党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出现失误。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我们党提出了阶级矛盾为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这改变了中共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这一论断并未及时公之于众。不久之后，《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的文章，其中谈到，阶级矛盾和两条道路的矛盾只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范围之内。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新界定，指出它不仅表现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还充斥在社会生活各方面。这表明我们党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彻底走向错误，中共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定发生了根本变化。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把握逐步演变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

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党的八大、再到八大二次会议，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研判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中共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把握未能一以贯之，这与波谲云诡、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密不可分。新中国的一贫如洗和潜伏在国内的不安定因素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使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研判产生失误。然而，在社会主要矛盾的曲折探索时期，把阶级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并不能构成矛盾的基本形态。因为，当时我们党只看到了矛盾的表象，这种表象是违背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统一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规律。

（二）社会主要矛盾的经济取向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停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我们党科学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解放了思想。此后，我们

党围绕社会主要矛盾这一主线，回归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逐步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的极端重要性和科学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一次探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在1979年中央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在我国表现为生产力水平低，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同时，他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和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或中心任务。改革开放初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一系列论述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步入正轨，表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关注集中在经济生产与人民需要层面。社会主要矛盾的规范表述是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大会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定为我国当时社会主要矛盾。这一判断是对八大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继承和完善，而且更有科学性、全局性、本质性。

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研判在党的十二大上被写进党章总纲；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分析了解决主要矛盾的办法；党的十四大把社会主要矛盾与党的基本路线相结合写入党章；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指出，当前中国存在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但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这一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同时，江泽民还进一步指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是发展。2000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仅提供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方法论，而且进一步明确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最广大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环境、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基于此，学术界围绕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展开讨论，但未达成共识。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化。同时，十七大的这一论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成为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党制定工作任务的主心骨、定盘星。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及习近平在庆祝建党95周年的讲话中都重申了经济层面的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三）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转向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这次重大判断改写了30多年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又一次转化。从此，需要和发展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社会主要矛盾此次转化的主要依据应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寻找。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与时俱进、乘风破浪、披荆斩棘，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40多年来，我国生产力已经大幅提升，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生产能力在许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9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社会迅速发展使得人民群众生存需要的物质文化“硬需求”基本得到满足，而社会层面的美好需要的范围和特征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方面，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范围已突破“物质文化”的范畴，延伸到生态环境追求、社保需求、政治诉求以及尊重感、安全感、归属感、成就感、获得感、幸福感等精神追求。另一方面，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呈现出多元化、多变化、个性化、层次化特征。社会供给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将长期成为制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突出问题。因此，协调需求端与供给端的关系，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任务。

总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并非偶然，它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主要矛盾会随着历史条件和矛盾两个方面的变化而变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历史过程，其内涵与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定义不同，它创新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理论。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历史必然性、连续性和渐进性。值得注意的是，要清晰认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须正确理解“变”与“不变”。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时代是思想之母，新时代呼唤新思想，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分步走发展战略的转化历程

新中国的成立改写了近代以来国家双重社会性

质的屈辱历史。追求国富民强、巍然屹立的民族姿态，逐步实现国家现代化，成为我们党的重要任务。完成这一重要任务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进行了反复、深入思考，逐步形成了分步走发展战略理论。纵观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党的分步走发展战略主要发生过三次转变。其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两步走”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虽存在一些不足，但为党的分步走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其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步走发展战略的进一步发展。其三，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的“两步走”发展战略，开启了新时代分步走发展战略的新征程。厘清我们党分步走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总结其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走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两步走”发展战略。

（一）“两步走”发展战略奠定了分步走发展战略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至改革开放前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逐步创立了“两步走”发展战略。早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要建立新中国，这个“新中国”是经济繁荣的国家。“新中国”目标激励着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谈到新中国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把农业国逐步转变为工业国。不久之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要分步骤建设工业化国家。这充分体现毛泽东已经萌生了新中国工业化要分步骤进行的意识。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后，党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再次强调，要在长时间内，逐步实现工业化。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但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毛泽东所指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目标，这表明毛泽东意识到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任务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同时也蕴含着分步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两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一次完整表述见于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

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4]这标志着我们党分步走发展战略的形成。1975年，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又重申了“四个现代化”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

关于“两步走”发展战略的时间节点，我们党根据国内外经验和国情进行了不断探索，然而探索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195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提出了共产主义在我国“不遥远了”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的误导下，“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多种脱离实际的运动、口号、指标被提出，进而导致了国民经济的短暂困局。面对急切冒进、脱离国情造成的窘境，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两步走”发展战略的时间进行了冷静思考。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多个场合提到，要彻底改变我国现状需要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的时间。但在1975年周恩来所做的政府报告中可以看出，党对“两步走”发展战略时间的把握仍不够充分。因为，事实证明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发展战略目标不太现实。尽管这一时期党对分步走发展战略的把握存在不足，但并不能抹杀“两步走”发展战略对党的分步走发展战略的奠基性贡献。

（二）“三步走”发展战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两步走”发展战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三步走”发展战略。此后，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提出和践行了更为具体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步走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实践创新。1979年，邓小平提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是中国式的，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为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一目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逐步探索。1982年党的十二大对20世纪最后20年的战略部署作了规划，初步提出了“两步走”发展战略。随着国内社会状况的发展，党的十三大确立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并对预期结果和时间节点作了深谋远虑的科学量化。“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实现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

步，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5]至此，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正式形成。“三步走”发展战略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两步走”发展战略更加科学、具体。其中，战略目标由“走在世界前列”调整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间由“20世纪末”调整为“21世纪中叶”。

理论创新要坚持推陈出新、吐故纳新。“三步走”发展战略遵循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发展战略理论。党的十三大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完成，党的十五大把第三步发展战略具体化，制定了更为具体的“三步走”发展战略。2012年党的十八大对具体的“三步走”中的第二步目标作了更为精确的规定，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大的这一发展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分步走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前提。

（三）新“两步走”发展战略开启了新时代分步走发展战略的新征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图伟业。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征程的基本问题。其中，分步走发展战略在我们党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定义，即新“两步走”发展战略。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节点分别为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从基本实现现代化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两步走”发展战略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开启了新时代分步走发展战略的新征程。

新时代“两步走”发展战略较之前的发展战略体现出新的特点。第一，在内容上更加具体、丰富。一方面，无论是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还是十五大提出的更为具体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两者的第二步与第三步之间存在50年和30年的长远差距，缺乏较为具体的战略步骤、战略重点和发展方向。而党的十九大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到本世纪中叶的30年分为两个更具体的15年。其中，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战略布局、发展动力、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步走”发展战略内容比以往丰富，它涵盖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次，其中，国家层面内容超越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还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国际影响力、

中华民族的整体形象。第二，对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把握上有了更新认识。党的十九大指出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时间比原定的 21 世纪中叶提前了 15 年。第三，对我国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发展目标不是中等发达国家，也不是基本实现现代化，而是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另一方面，除了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有新的发展要求以外，对民主、法治、社会保障、人民共同富裕、国家综合治理能力、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等方面亦有更高标准的发展质量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制定的分步走发展战略虽有所不同，但又有着十分紧密的逻辑联系。一是在战略目标和时间节点上能够前后衔接。“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一步是在“两步走”发展战略基本完成的基础制定的，而且时间均是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更为具体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一步是在“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二步的基础上制定的，时间为 20 世纪末期。新“两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一步又是在更为具体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二步基础上制定的，时间为 2020 年。二是在制定分步走发展战略时，我们党有着横向和纵向维度的大视域。其一，有横向的国际视域。纵观分步走发展战略的发展历程，我们党在目标、步骤、时间、内容等方面的把握上参照了国际水准。比如“经济走在世界前列、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目标均体现了这一特点。其二，有纵向的战略规划视域。我们党在制定分步走发展战略步骤时，把建党 100 年的 2020 年、建国 100 年的 21 世纪中叶作为分步走发展战略目标完成的重大时间节点。

三、社会主要矛盾与分步走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

通过研究和分析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分步走发展战略的转变历程，可发现二者在历史演进的时间节点上有着高度的吻合性，并呈现出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逻辑关系。二者内在的关联性可解释为：社会主要矛盾是制定分步走发展战略的决定性因素，因而也是规划分步走发展战略的客观依据；分步走发展战略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路径；二者的目的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都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一）社会主要矛盾是制定分步走发展战略的客观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党的八大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再到党的十九大，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经历了三次主要转变。认真考察和研究社会主要矛盾的多次变化，可发现“社会矛盾的本质仍是供求之间的矛盾”^[6]。从人民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到人民需求与发展之间的矛盾，需求端一直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一方。落后的农业国、落后的生产、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则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供给方。供给与需求构成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战略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分步走发展战略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的具体环节和重要时间节点也必然受到社会主要矛盾这一客观条件的制约。

从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社会主要矛盾的三次重大转变引起分步走发展战略的相应变化的事实来看，社会主要矛盾的确是制定分步走发展战略的客观依据，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引起了分步走发展战略的调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迫切希望解决党的八大确定的社会主要矛盾，希望通过经济文化发展带来更加丰富的物质文化产品。基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两步走”发展战略。十一届六中全会后，面对“文革”造成的经济发展停滞、民主法治缺失、人民生活水平亟待解决的困局，我们党把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为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党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并在这一过程中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国内外形势提出需要和发展层面的矛盾是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基于此，我们党提出了新“两步走”发展战略，以期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另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内涵决定分步走发展战略的内容。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研判决定了“两步走”发展战略要发展先进工业，摆脱落后的农业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需求。因此，“两步走”发展战略中无论是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还是实现现代化的内容，都是由八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主要内容

有：不断发展经济；解决人民温饱；进而达到小康；最终基本实现现代化等。这是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新“两步走”发展战略的内容更加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并且更加具体。毫无疑问，这是由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

（二）分步走发展战略为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具体路径

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和国家制定主要任务的客观依据，而完成主要任务的过程也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如果说“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不遗余力地完成主要任务、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宏观路径和长远规划，那么分步走发展战略则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路径。

分步走发展战略为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所提供的具体路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为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完成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制定了可操作性的阶段性目标。虽然党的八大到党的十九大，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三次历史性转化，但党和国家在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现代化展开。由于我国现实国情与现代化强国目标相差甚远，我们党根据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特征，制定了分步走发展战略，提出了与时俱进的阶段性目标。比如，从“两步走”到“三步走”再到新“两步走”，最后目标均是实现现代化，但是前一步或者两步都规定了近期的具体目标。近期目标便于党和全国人民在追求现代化强国的远大理想中不易疲倦和迷失方向，更容易把握好国情，增强了现代化目标的可控性。第二，分步走发展战略为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完成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规定了较为科学的时间表。中国共产党不是空谈者，而是实干家，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科学的时间表把远大理想与阶段性目标联系起来，发扬了我们党实干兴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两步走”发展战略中第一步的实现时间为20世纪80年代，“三步走”发展战略中每一步的实现时间分别为20世纪90年代末、20世纪末、21世纪中叶；更为具体的“三步走”中每一步完成的时间分别为2010年、建党100年、建国100年；新“两步走”中每一步的完成时间为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这一个个时间节点为化解社会主要矛

盾、完成现代化强国目标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时间表，有利于在发展的过程中既保证质量又保证效率。

（三）二者历史演进的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要矛盾与分步走发展战略在演进过程中具有目的同一性，二者的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践探索和理论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丰富的过程，经历了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演进过程。“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矛盾是决定主要任务的根据。”^[7]虽然社会主要矛盾对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起决定作用，但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对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有着反作用。社会主要矛盾最终化解的结果与主要任务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因此说，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与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

把我国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是宏图伟业，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依据党的基本路线，大概需要一百年的时间。把用近百年光辉岁月铸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定义为宏伟目标，那么“两步走”“三步走”、新“两步走”发展战略中的每一步目标则是我们党上下求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道路上的阶段性微观目标。无论是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还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分步走发展战略步骤中每一步的实现均是为实现现代化强国添砖加瓦。宏伟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结合，既体现出我们党心怀远大理想抱负，又彰显出脚踏实地的实干作风。因此说，分步走发展战略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强国梦，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具有目的同一性。

（四）二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还是在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任务中制定的分步走发展战略均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具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与分步走发展战略分别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

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经历了多次的转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追根溯源,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根基。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系统地阐述过社会矛盾理论,但在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过程中,其关于社会矛盾学说的论述不胜枚举,并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班班可考。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对社会基本矛盾两对范畴进行阐述,提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阐发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这一矛盾运动规律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必然导致革命发生。马克思恩格斯锲而不舍地探索人类历史规律,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及其根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了“资本的基本矛盾”的概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揭露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个别工厂的有组织性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其实这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矛盾的体现。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恩格斯进一步系统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有了科学的定义。列宁继承、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矛盾,但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然存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依旧存在矛盾,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正确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还研究了当时存在的重大矛盾关系。

上述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研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既有科学的认识又有错误的判断。在错误中吸取教训,在探索中寻求真理,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地位、意义、内涵等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历史车轮和时代潮流滚滚向前、浩浩荡荡,社会主要矛盾在历史的潮流中不断转化,但唯一不变的是其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这一理论根源。

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分步

走发展战略的理论根基。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长久的过程。既然共产主义社会不能一蹴而就,那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基于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逐渐提出了“过渡”时期理论,即有步骤、分阶段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革命首先要取得统治地位,之后一步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8]概念,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仍存在种种弊病,要摆脱弊病需要一个长久过渡过程,分步进行很有必要。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过渡”理论,提出并践行了“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认为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要想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鉴于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9]以上理论均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理论的高度概括。它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是从宏观维度对共产主义社会分步发展的科学认识。我们党带领人民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实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道路上的重要阶段性目标。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制定的分步走发展战略是对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发展步骤的微观把握,是对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创造性应用。因此说,分步走发展战略是对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四、结语

社会主要矛盾关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它具有根本性、长期性、复杂性,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社会主要矛盾的每一次转化都会引起我们党工作中心的转移,同时,影响分步走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历史经验表明,每当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有着正确认识,并与主要任务紧密联系时,社会主义建设就会顺利推进,分步走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就会顺利进行。反之,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越偏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越会遭到损失。

党的八大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规划了蓝图,

并为分步走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其中,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的认识,并提出主要任务是把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先进的工业国,基本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然而,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用错误的阶级矛盾、“两条路线”矛盾代替了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真知灼见。虽然,此时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出现失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党的主要任务仍是发展生产、实现现代化。随着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的长期偏离最终导致我国发生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脱离国情的生产运动,阶级斗争扩大化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影响了对分步走发展战略的制定。1975年,周恩来在“两步走”发展战略中提出第二步是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事实证明第二步战略目标不符合中国实际。由于错误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导致了主要任务脱离正常的轨道。社会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制定脱离了正确轨道,主要原因是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热情高涨,高估了我国的发展速度,以致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条理解,使脱离国情、违背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状况一发不可收拾。

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错误,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历史是庄重的,不容亵渎,它凝聚着过往同时昭示着未来。目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在这一重大历史节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充分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征、新要

求,同时必须深刻认识并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波谲云诡、风云变幻,世界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特征、人民的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势必会出现新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党要与时俱进,认清国情,保持冷静,时刻把握好社会主要矛盾这条主线,调整好分步走发展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进而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 [1]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39.
- [2]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5.
-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 [4]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9.
- [5]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9.
- [6] 闫坤.新时代:以新的主要矛盾标识新的历史方位[J].学习与探索,2017(12):4.
- [7] 韩克勇.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谈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31.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5.
-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2.

【责任编辑: 闫生金】